

话。在珍贵的集体生活过程中，我们朝夕相处，磨练了性格，收获了成长，懂得了合作。大学同窗的友谊也成为走上社会后相互激励、扶持、陪伴成长的驱动力。比如，是发51的夏健同学把我“忽悠”到的华为，我们一直是最好的同事和朋友。在清华，我们有幸遇到太多的全国乃至全球的优秀同学，还有各专业领域的学术大师和遍布世界各行各业的杰出校友。这是我们人生莫大的财富。

邱勇校长在最近致辞中强调：“自强是清华人的精神底色，自强的清华人永远保持奋进的姿态！”我们对此深以为然。

30年弹指一挥间，我们已从青葱少年进入人生“下半场”，我们距离“为祖国

健康工作50年”尚有很大差距，吾辈当再接再厉，不负清华，不负青春。我们有理由对过去的30年“满足”，对现在“满意”，更对未来“满怀希望”。

我由衷地感恩清华的悉心培养，并向母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，祝愿清华，祝愿祖国，祝愿世界更美好！ 2020年4月19日

唐晓明，1995年加入华为公司，曾任欧洲片区副总裁、中国区常务副总裁、全球销售与客户群总裁、公司高级副总裁等职。在华为任职24年间，是华为公司从小到大、从国内到海外、从跟随到全球领先发展历程的重要贡献者。现任华为公司高级顾问、华为大学教授。

三十而立

○王川（1986级美院）



2020年1月，王川在个人摄影展开幕式上致辞

有些事情要想明白，好像还非得30年不可。

在这样的时间点上，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和事以及关于他们的回忆，其中有些已被时间消弭变得模糊，但另有一些却因岁

月的磨洗反而绽出更加生动的光泽。2020年，对于1990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本科毕业的我来说，此时的感觉刚好就是这样。

都说三十而立，这要看怎么说了。反正现在看来30岁那时候，我离找到北好像还差着那么一截子，尽管当时自己觉得很有方向。然而今天，如若是以毕业为起点而论的话，我大致可以确定自己是走在向北的路上。

虽然不想太过宿命和矫情，但一回头这30年里的各种因缘际会，诸多机缘巧合和各种磕磕绊绊却也让我唏嘘。1990年毕业后，我逐渐发觉在书籍艺术的专业范畴里，自己更偏插图而不是设计，所以1992年进入少儿社后，成天画儿童插图觉得舒

□ 值年园地

服得不行，于是就想一辈子干这个倒也不错。之后，也当真干了十多年。然而，由于在1987年下乡前一不留神着了照相机的道，逐渐开始迷上摄影再也无力收手，所以在1998年决定去读个研，非要把它整个明白。2000年前后，随着最后一本儿童画（现在更时髦的名字叫“绘本”）脱手，这画笔一放就是16年。

1986年我终究没去中央美术学院年画、连环画系，而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艺术系，但我却在2000年兜了个大圈子之后就职于中央美术学院，花了七年时间建设摄影专业。我曾诸事被动，认定一技傍身走一步说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却因学了摄影变得越来越看重数字、认可预想依靠计划，最后阴差阳错地做起了中央美院的学院规划。2018年，来访的格拉斯哥美术学院新院长问我，怎么他们学校战略规划的负责人也是搞摄影的，站在那我愣了半天。

我曾被很多人认定会是第一批往国外跑的人。读本科时看着那些进口画册也确实觉得眼花缭乱心向往之，恨不得全部拥

有，但却在1992年的甘陇之行后对西北的一切燃起了浓厚兴趣，时至今日竟是有增无减。

研究生毕业那阵子，我觉得摄影天地广阔令人兴奋，一天到晚跃跃欲试。但在真正要放下插图，以为将和本科专业渐行渐远的那一刻，心里还是不免小有遗憾和感怀。然而后来的事实再次证明，搞明白自己的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听说从1986级开始，高中应届考入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占比明显增加，这些人应该都算是顺风顺水，那种自带的嘚瑟和不知天高地厚几乎有点掩饰不住，否则第一次新年舞会上也不会被高年级嘘哄。但很快，在我见识了同届中以李芸为首的一干老工艺美校的手头功夫后，嚣张的气焰立马低落，两脚也终于踩在了地上。然而窝回去的那点子躁动总得有个出口，于是后来就去跳霹雳。那阵子北楼的水磨石地面被我们拿后背和膝盖擦得局部锃亮。

愤青是一定要当一下的，否则哪好意思说自己是搞艺术的，区别只是你能坚持多久。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，我虽

然没有像崔健说的“始终保持微笑”，但好像也真的无法保持愤怒。但即便如此，在面对刚一毕业就迅速普及的照相植字技术时，我还是没少嚷嚷抱怨：学校教学上怎么就不能有点前瞻性，怎么就不能多教点新东西，却让我们在美术字上浪费那么多精力？现在明白了，那时的光火其实是一种面对



中央工艺美院 1986 级书装班男生合影，前排中为王川

新技术和新事物的恐惧和心虚。那种被瞬间架空的感觉，北京话叫“被闪着了”，那种手足无措的囧确实需要排解和宣泄。然而没多久我就不闹腾了。那一笔一划、整张整开练出来的美术字功夫，让我在店大不只欺客的北京饭店——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出足了风头。看着蹲一地在刻我徒手写的美术字横幅的员工们，我很欣慰。而经由专业训练养成的对字体的敏感苛求所带来的更多裨益，则是在其后很长时间里慢慢释放和被感知到的。直到在这种养分都时常让我有被赋能的感觉。

另外要说的就是，那四年里塑就的对专业 and 专业化思维的笃信（研究生阶段被我的德裔导师进一步强化），这一点也是至今不变。尤其是在跨界当红的时下，我仍然坚信从专业出发是实现跨界的不二路径和基本前提。其实这也正是我自己的路径。近日见到马泉、大力和凌健三位师兄，在走向当代艺术的路上他们都是榜样和引领者。

在专业这个问题上，我可以比较死性，但在我们这一届里还是显得不够纯粹。遥望甘肃，《读者》这面旗帜在纸媒朝不保夕的今天还是奇迹般地屹立不倒。我觉得任伟那张老脸绝对应该是上面的核心图形——从毕业开始他就没动过地方。同样的情况听说还有二十多年未见的谢成，据说他现在比以前更喜欢封面设计了。

但活跃通达的人似乎更多。如果我能算跨界，那他们都得是跨领域，对他们我只能羡慕。去年我刚刚见识了童迅的家庭暗房，说实话站在暗房里我觉得他比我更爱摄影。但是出了家门他的主业是自己一手打造的品牌和企业，那是个我想想都头

大根本不敢染指的事情。可跟林荣桓的锦鲤相比，这好像还是“本分”了一些。刚刚接到广州大学美术学院贺景卫院长的召唤，他这30年的行踪复杂到我至今无法完整复述。这样的人还有赵雨东，且过犹不及。我老说你们不写本书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点不负责任。不过每次碰在一起我们聊得更多的还是四年里的那点事，相当单纯永不嫌烦。科宝博洛尼的王总兴鹏，曾给我的学生提供了难得的实习机会和指导。打开手机划拉不了几下你就会看到方放在教书法。在美国见到乌翀特别高兴，当了艺术家的她过得滋润。而当别人说起《大中国》和高枫时，我的眼前却只有在昏暗楼道里练琴的曾焰赤。

我们这届人似乎没什么整体形象，但却从不缺乏由各种奇葩神人共同构成的“生物多样性”，这更具质感。我们这届人似乎有点散，但我觉得这才是常态，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表象之下，是千丝万缕带温度有韧性的情感纽带。这不，宝华找不到我就找王菲霞一逮一个准儿。别看平时不太走动，但他交代的作业我会全力以赴做好。需要填补的空白当然有，我老想着找不着人了的黄振波、刘益兵和不肯联系的张阳。

我一直认为，我们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赶上了最好的时段、最好的老师和同伴。当然可能每一届同学也都这么想。我只是认定我这不是虚言——每一次当我清楚地意识到30年前的彼时，被注入的养分已经被吸收转化成了个人后天源代码的组成，依然直接影响着当下自己的思考和行为时，我就觉得这些学院最慷慨的馈赠至今还在身上。

2020年10月26日于望京